

2005-2025年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研究综述：现状、争议与趋势

于颖涵^{1*}，徐佳晴¹，苏 晗¹，周新舒¹，张丹宁¹

(1.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市，102206；

* 通讯作者，yu_yinghan@qq.com)

摘 要：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研究是翻译史与性别研究交叉的重要领域，聚焦于女性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思想启蒙中的独特作用。本文对2005—2025年间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发现核心主题包括“翻译选材的文化动机”、“翻译策略的性别视角”与“历史贡献的整体评价”等。研究指出，五四女性译者通过选择易卜生戏剧、女性题材文学等具有社会启蒙意义的文本，形成“共同议程”；在策略上采用“忠实与干预并存”的杂合方式，构建“新女性”话语；在历史层面，借助报刊与思想同盟，推动了现代性建构与性别意识觉醒。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史料稀缺、方法单一、理论应用不足等问题。未来应拓展研究对象、引入跨学科方法、转换研究视角，以深化对五四女性翻译的多维理解。

关键词：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翻译策略；性别视角；现代性建构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五四时期的女性翻译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与女性解放运动交织的关键领域，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这一时期，西方女权思潮东渐与国内新文化运动激荡，女性译者群体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桎梏，以翻译为媒介参与思想启蒙，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她们的译介实践不仅推动了外国文学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更成为女性表达自我意识、争取社会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为“新女性”形象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文本支撑。从学术层面看，五四女性翻译既折射出近代女性教育发展的轨迹，也反映了翻译活动对社会文化转型的深层影响，是研究近代女性史、翻译史与思想史的重要交叉议题。

1.2. 目的和意义

撰写五四女性翻译研究综述具有鲜明的必要性与现实价值。从研究现状来看，现有成果多聚焦于男性译者的译介实践或宏观的翻译史梳理，对女性译者群体的系统性考察相对薄弱。尽管部分研究提及裘毓芳、薛绍徽等译者的个案，或涉及女性翻译与女学兴起的关联，但缺乏对五四时期女性翻译的整体脉络、译介特色及社会效应的全面梳理，尤其在女性译者的译介策略、文本选择与女权意识表达的内在关联方面，尚有诸多研究空白。

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本综述旨在厘清五四女性翻译的发展阶段、核心译者与代表作品，剖析其译介理念与实践特征，揭示翻译活动与女性解放、文学革新及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既能填补现有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丰富对五四时期翻译生态与女性社会角色变迁的认知，也能为当代女性翻译研究提供历史参照，为探讨翻译与性别、文化传播的深层关联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对拓展比较文学、女性研究与翻译研究的交叉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 文献筛选与研究方法

2.1. 文献来源

为全面梳理国内关于五四女性翻译的研究，本综述主要依托中国知网（CNKI）学术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该平台汇聚了海量学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能为研究提供丰富素材。同时，为弥补电子资源的局限性，笔者前往国家图书馆，深入查阅相关学术专著、历史档案及未数字化的期刊合订本。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确保文献来源的多元性与全面性，力求囊括该领域各类型、各时期的研究成果。

2.2. 筛选标准

2.2.1. 时间范围

重点聚焦近二十年（2005-2025年）的研究文献。这一时期学术研究方法不断革新，学界对五四女性翻译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成果更为丰硕且前沿，能精准反映当下研究动态与趋势。

2.2.2. 研究主题

检索词设定为“五四女性翻译”、“五四时期女译者”、“五四女性翻译策略”以及“五四女性翻译的社会影响”等，严格筛选出核心内容围绕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实践、翻译思想、译者个体研究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互动的文献，排除主题偏离的无效信息。

2.2.3. 文献类型

优先纳入学术期刊论文、硕博学位论文及学术专著，因其研究深入、论证严谨，学术价值较高。同时，适当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会议论文、研究报告，以拓宽研究视野，捕捉学界最新讨论热点。经层层筛选，共获得有效文献百余篇。

2.3. 数据处理方法

2.3.1. 主题分类法

将百余篇文献按研究侧重点分为“宏观翻译策略”、“个案译者研究”、“翻译与社会文化”、“研究方法 with 理论”等主题板块。如探讨五四女译者普遍采用的直译、意译倾向归为“宏观翻译策略”；对冰心、陈衡哲等具体译者的剖析归入“个案译者研究”，使文献条理化，便于同类对比分析。

2.3.2. 观点归纳法

针对每个主题板块内的文献，详细归纳作者核心观点、研究方法、所得结论及创新之处。梳理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如在“翻译与社会文化”板块，归纳学界对五四女性翻译推动女性解放、促进文化革新作用的多元观点，呈现学术争鸣，挖掘研究共识与分歧，为后续综合分析奠定基础。

3. 研究成果与分析

我们从宏观层面的研究将五四女译者视为一个文化群体或一种历史现象，旨在探讨其翻译活动的整体特征、共有的文化策略与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研究认为该领域的宏观研究可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三个方向：

3.1. 翻译主题与选材的文化动机研究

该类研究关注女译者“译什么”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学者们普遍认为，她们的选材绝非偶然，而是回应时代需求的主动文化选择。

3.1.1. 核心文献

在五四时期女性译者的选题实践中，吕碧城采取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创造性策略。正如谢海燕与李姣（2025）所指出的，其目的并非简单移植西方女性主义，而是要“抒其本色”，构建一种融合性的本土女性话语体系 [1]。这一选题思想清晰地体现在她的文本选择上：她可能更倾向于翻译那些西方作品中关于“天赋人权”的论述，以为中国女性争取权利提供理论武器；同时，她也可能青睐那些刻画了坚强、独立女性角色，且其行为逻辑能被中国文化语境所理解和接受的叙事作品。通过这样的选题，她巧妙地绕开了男性译者

常有的理论化与说教倾向，转而从情感和伦理层面直接触动女性读者，实践了一种更具操作性和感染力的女性主义传播路径。

邱经（2020）对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戏剧作品的研究，以及彭莹（2025）对民国时期儿童文学女译者群体的考察，共同印证了这一观点。邱经的研究发现，吴弱男、薛琪瑛等女译者的戏剧翻译选材高度集中于易卜生主义社会问题剧（如《玩偶之家》）和西方经典戏剧等领域，核心指向妇女解放、婚姻自主与社会正义等议题[2]。彭莹则指出，儿童文学女译者在选材上侧重“儿童本位”与“启蒙教育”双重主题，通过译介童话、成长故事等文本，既传递性别平等观念，也回应了国民性改造的时代需求[3]。这些主题高度统一地构成了五四时期女译者通过翻译参与社会改造的“共同议程”。

此外，张舒（2013）在《薛琪瑛〈意中人〉剧本翻译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指出，薛琪瑛选择翻译王尔德的戏剧作品，正是看中其文本中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隐性反叛与对女性自主意识的细腻表达[4]。这种对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西方戏剧文本的译介，实质上是借助外来文学中的思想资源，回应本土女性在解放过程中打破婚姻束缚、争取人格独立的现实诉求，与其他女译者的选材逻辑形成呼应。

3.2. 翻译策略与话语构建的性别视角研究

该类研究从“怎么译”入手，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视角，分析女译者如何在语言层面践行其性别意识与文化主张。

3.2.1. 核心文献

赵启红（2019）在《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的双重追求——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和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中深刻指出，五四女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形成了“忠实与干预并存”的策略特征。面对原文中的性别话语，她们常采用增写序言、强调性注释、情感化改写等“显性干预”手段，同时坚守“异化为主、本地化为辅”的语言策略[5]。该研究认为，这些策略远非单纯的技术选择，而是她们在父权制语言体系中争夺话语权、构建“新女性”话语的政治行为，实现了民族启蒙与性别表达的双重目标。

邱经（2020）对吴弱男、薛琪瑛和沈性仁戏剧翻译的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具体例证。她发现，译者以“忠实”为根本原则，通过异化策略引入西方戏剧的新表达与新思想，但在处理女性形象描写、情感场景刻画时，常巧妙融入“本地化”策略，如运用四字格、类文言语言传递女性情感细腻性，这种“杂合”策略既迁就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更利于在中文语境中构建新颖且易接受的“新女性”话语。乔敏（2014）从翻译规范理论视角对薛琪瑛汉译王尔德作品的研究也显示，译者在遵循“忠实”规范的同时，通过语序调整、语义强化等方式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实现了翻译策略与性别话语的有机融合[6]。此外，鲁宵旻（2017）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策略的研究指出，女译者普遍采用“显性注释+语境化改写”的策略，使外来性别平等思想更易被本土接受[7]。

3.3. 历史贡献与群体形象的整体性评价研究

该类研究旨在整体评估五四女译者群体的历史地位，力图在宏大的文学史和翻译史叙事中为其确立坐标。

核心文献

蓝红军（2014）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翻译现代性_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述评》中明确将五四女译者定义为“现代性建构的关键参与者”，系统梳理了其成员（如薛琪瑛、沈性仁、吴弱男等）、活动阵地（《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和翻译成果。该研究指出，女译者群体在三个层面贡献卓著：一是通过译介西方女性主义著作，为中国女性解放提供思想资源；二是在翻译实践中丰富白话文表达，推动语言现代化；三是借助翻译打破性别话语垄断，构建女性主体身份。该文首次从“现代性发生”的高度定位女译者群体的历史价值，成为该方向的奠基性研究[8]。

此外，赵启红（2019）的《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的双重追求——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和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进一步补充了前者的观点。该研究通过史料挖掘指出，女译者的群体影响力形成，一方面依托《新青年》等新兴报刊的传播力，其译作借助媒体实现广泛扩散；另一方面依赖与男性知识精英的“思想同盟”，如与陈独秀、周作人等的译介合作，获得话语发声的平台。这一发现将研究从“贡献是什么”推进到“贡献如何成为可能”的深层维度。此外，曹双飞（2024）对20世纪初女性译者地理分布的研究揭示，女译者群体的形成与沿海通商口岸的文化开放环境、女校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为理解群体形象的生成提供了社会文化背景支撑[9]。刘川愉（2020）在《近代女性小说发展演变研究》中强调，五四女译者通过翻译小说构建的“新女性”叙事（如裘毓芳白话译作的启蒙性、薛绍徽对西方女性形象的本土化演绎），不仅直接推动了近代女性自著小说的兴起（如《女狱花》的诞生），更将“性别平等”“人格独立”等观念融入文学创作脉络[10]。这种译介与创作的联动，为后续女性文学聚焦自我表达、婚姻自主等议题提供了直接的文本参照与思想养分，其历史价值在女性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彰显。

4. 研究趋势与挑战

4.1. 未来研究方向

4.1.1. 拓展研究对象的广度与深度

目前，五四女译者研究多集中于薛琪瑛、沈性仁、吴弱男等少数知名译者。未来应挖掘更多小众译者，如通过地方报刊、女校校刊等边缘史料，探寻那些被忽视的女译者身影，她们或许来自不同地域、教育背景，其翻译实践能为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样本，完善对五四女译者群体的全貌认知。同时，研究不应仅停留在译者个体，可拓展至女译者群体与当时文学社团、文化沙龙的互动，分析群体间思想交流、翻译资源共享等现象，从社会网络视角剖析女译者群体影响力的形成与扩散机制。

4.1.2. 推进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

传统翻译研究方法对五四女译者研究存在局限。未来可引入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方法。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法，若能找到五四女译者后人或相关文化场所，获取一手口述资料，可生动还原女译者生活与翻译场景；历史学的史料分析法，结合档案、书信等一手史料，精准分析女译者翻译活动与时代政治、社会变革的深层关联；传播学的量化分析，统计女译者译作在报刊杂志的传播范围、引用频率，量化评估其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打破单一研究视角的壁垒，为研究注入新活力。

4.1.3. 转换研究视角，关注翻译的社会文化效应

过往研究多聚焦女译者翻译策略、选材动机。未来可从接受美学视角，研究五四时期读者对女译者译作的反馈，通过读者来信、书评等资料，洞察译作如何影响不同阶层读者的性别观念、文学审美，以及在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作用。还可从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视角，分析女译者在翻译西方文本时，如何抵抗西方文化霸权，同时利用翻译为本土女性争取话语空间，实现对本土性别文化的重塑，挖掘翻译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文化政治内涵。

4.2. 挑战和不足

4.2.1. 史料稀缺与零散

五四时期距今已远，女译者相关史料历经战乱、社会变迁，保存下来的数量有限且极为零散。许多女译者译作发表于当时报刊，报刊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善，部分内容缺失。女译者个人档案、日记等一手资料，或因未受重视未留存，或散落于私人手中难以获取，导致研究难以全面、深入地还原女译者翻译活动全貌，限制了对其翻译思想、实践细节的精准把握。

4.2.2.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

现有研究多采用文本分析法，从女译者译作本身挖掘翻译策略、思想内涵。虽有一定成果，但单一方法无法全面解析复杂的翻译现象。缺乏多学科交叉融合，难以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元维度剖析女译者翻译活动的深层动因与广泛影响。在研究女译者群体形成机制时，仅靠文本分析难以揭示背后社会结构、教育体系等因素的作用，导致研究深度与广度受限。

4.2.3. 理论应用不够深入

部分研究虽引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前沿理论，但多停留于表面套用，未充分结合五四时期特殊历史语境深入阐释。如在分析女译者翻译策略与女性意识关系时，未能深入挖掘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联系，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无法充分发挥理论对研究的指导作用，也难以从理论层面深化对五四女译者翻译活动独特性与历史价值的理解。

5. 总结

5.1. 综述总结

本文系统梳理五四时期女译者群体研究的核心脉络，发现该领域宏观研究聚焦三大方向：翻译选材上，女译者以易卜生主义社会问题剧、女性题材文学等为核心，形成回应妇女解放与社会启蒙的“共同议程”；翻译策略上，呈现“忠实与干预并存”特征，通过异化引入新思想、本地化适配本土语境的杂合方式构建“新女性”话语；历史贡献上，女译者群体借助报刊传播与思想同盟，成为现代性建构与性别话语奠基的关键

力量。个案研究则围绕薛琪瑛、沈性仁等译者，揭示其在文本操控、思想传播中的主体性实践，整体呈现从“现象描述”到“深层机制”的研究进阶。

5.2. 研究意义

该领域未来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价值。学术层面，挖掘小众译者、运用跨学科方法可填补现有研究空白，完善中国现代翻译史与女性文化史的叙事，厘清翻译活动与社会转型的互构关系，为翻译研究提供“性别—文化—历史”交叉的本土范式。现实层面，重审女译者借翻译推动思想革新的实践，可为当代跨文化传播中性别话语的建构提供历史镜鉴，为女性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传承提供思路。其对“外来思想本土化”“话语权力争夺”的探讨，亦能为当代性别平等理念的传播与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 谢海燕, 李姣. 文学翻译与五四时期“隐秘的”世界女性主义 [J]. 外语教学, 2025, 46(3):91-97.
- [2] 邱经. 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戏剧作品翻译策略研究 [J]. 传播力研究, 2020, 4 (16): 23-24.
- [3] 彭莹. 翻译实践与性别实践的交互:民国时期儿童文学女译者群体研究 [J]. 外语导刊, 2025, 48 (2): 68-75.
- [4] 张舒. 薛琪瑛《意中人》剧本翻译中的女性主义研究 [D]. 成都理工大学, 2014.
- [5] 赵启红. 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的双重追求——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和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12): 109-114.
- [6] 乔敏. 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的薛琪瑛汉译王尔德 *An Ideal Husband* 研究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 [7] 鲁霄映. 例谈新文化运动时期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 [J]. 文学教育 (下), 2017 (12): 78-79.
- [8] 蓝红军. 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述评 [J]. 中国翻译, 2014, 35 (2): 64-67.
- [9] 曹双飞. 20 世纪初 (1900—1937) 女性译者地理分布及其缘由索隐——基于《中国翻译家辞典》的扫描 [J]. 外国语言文学, 2024, 41 (5): 75-84.
- [10] 刘川愉. 近代女性小说发展演变研究 [D]. 华东师范大学, 2020.